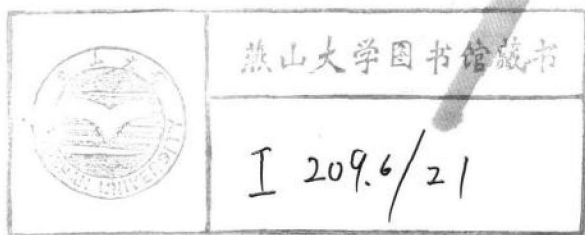


浅草

浅草 — 沉钟社研究

秦林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浅草——沉钟社研究

秦林芳 著



035077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浅草—沉钟社研究/秦林芳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12

ISBN 7 - 5004 - 3725 - 0

I. 浅… II. 秦… III. 文学—社会团体—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5381 号

责任编辑 刘三华

责任校对 尹力

封面设计 师若

版式设计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64030272

网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丰华装订厂

版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2

字数 294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2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浅草—沉钟社研究》

杨 义

今年在长沙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年会，吴福辉先生有这样一个担心，他把现代文学研究比做一个矿产，说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现代文学这个“富矿”会不会被挖掘殆尽，变成“贫矿”。吴先生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从现代文学的学科研究来看，在 80 年代初，它成为一门“显学”，无论是整体的研究，还是一些被埋没的作家的发掘，其研究成果总让人耳目一新；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学科的研究还带动了相关学科研究的发展。但随着学科研究框架的确立以及逐渐的“血肉丰满”，这个学科的研究的确是露出了一些“老态”。当一些三流作家也被挖掘殆尽后，人们发现这三十年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被开垦过了，于是就会有“贫矿”的感觉。

这样的说法当然有道理，不过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就是“富矿”是从哪里来的？事实上，并没有天生的“富矿”，是否成为“富矿”，往往更依赖于研究者的学术眼光、研究方法和角度的选取。现代文学研究在 80 年代之所以成为“富矿”，正是由于它突破了 50—70 年代的研究框架和思路，因而显示了极大的研究活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并没有什么

/

绝对的“富矿”和“贫矿”。学术研究一要靠心血，二要靠眼光。心血和眼光的结晶物就是新的学术生命和学术境界。

秦林芳选择浅草—沉钟社这样一个研究课题，就研究对象的选择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作为现代文学的社团研究，研究浅草—沉钟社的意义当然比不上研究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也比不上语丝社，而且，即便是如此，之前对浅草—沉钟社的研究也已有了很多的成果。这真好像“富矿”变“贫矿”一样。因此选择这样的课题是需要勇气的，而要把它做好，那就更需要研究者的学术能力了。

事实上，90年代以来，还是有不少研究者做社团和杂志研究的，不过他们的研究思路和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80年代会更侧重于美学的研究，比如考察一个社团的文学主张、美学倾向和艺术特征等等，而90年代后这种研究思路开始蜕变，研究方向逐渐转移到文化研究的路数来，关注的更多是社团、杂志背后的文化语境以及文学体制等问题。比如王晓明对《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的研究，他更看重的是那些文本外面的现象，对文学研究会，他不仅看那些会员写了哪些作品，更要看那个社团本身，看他的发起人名单，它的组织机构、它的宣言和章程，要看这个社团是如何出现，又如何发展，看它对文学生产和流通，对整个现代文学的进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显然这样的思路极大地开阔了研究视野，展现了社团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贫矿”又变成“富矿”了。

但这并不是说原有的那种美学研究的思路就失效了。关于文化研究和美学研究的关系，这也是近些年研究界讨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总体上来说它们的关系不应当是对立的，美学研究也不能说就是过时的。研究思路的发展变化并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新的里面总是有旧的合理的内核，而旧的要发

展，一定也会增加进新的变化。秦林芳的关于浅草—沉钟社的研究，整体上还是属于美学研究的思路，但他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做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特别是对浅草—沉钟社文化思想的研究，之前并没有多少人论述过的。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不过更有价值的在我看来是他研究中的文学史意识。这也告诉我们，文学研究中的美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是内外相蕴，相互阐释和深化，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动态的诠释学系统的。在这里，重要的是学而能化，在美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达致一种化入与化出的自由境界。鲁迅说沉钟社是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从1922年到1934年，其间虽然时断时续，却也“挣扎”了12个年头，而且这12年是横跨了二三十年代，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他们和创造社不同，文学理念和主张没有激烈的变化。研究前后期创造社的变化，是可以梳理出一条文学史叙述的线索的；而同样对浅草—沉钟社的研究，也可以梳理出不同于创造社的文学史叙述。这样，我们对文学史的认知就丰富了，不会流于单一的线索。对文学史叙述而言，多流派、多个性、多线索的错综比较和深刻体味，才能呈现出万紫千红、波澜壮阔的本来状态。这种复线性的叙述，比起脱离现象丰富性的单线性叙述，其文化意义不言自明。因此，将浅草—沉钟社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考察他们人员、主张的变化，考察他们写作风格的承续和连接，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来切入更大范围的文学史研究。这要比单纯的社团研究更有学术价值。作者很清楚这种研究的意义，他说：“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每一种文学思潮的出现，每一种创作倾向的形成，我们几乎都能从中看到社团的背景和身影。反言之，每一个社团作为一个局部对文学史这个整体来说几乎都有结构性的意义。而对浅草—沉钟社这样一个具有较高文学成就和较大文学影响的社团的研究，对于丰富此期

文学史研究内容、厘定其框架结构显然更具有历史的价值。”我觉得，这显示了作者较高的学术视野和自觉的学术追求。对于一部博士学位论文来说，这也是很优秀的。

但显然，这样的研究具有很大的难度。它要求研究者既要有非常广阔的学术视野，整体的文学史叙述的把握和观照，同时，又能将这些融入非常具体的个案研究中。其中所要面临的矛盾、复杂的情况是不难想见的。我觉得作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的努力，特别是在微观的研究中，在把握浅草—沉钟社整体的创作个性和风格的变化上，是做了很细致的研究的，也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文学史变迁的脉络的。而且，作者在研究中，还有良好的比较意识，这主要表现在对浅草—沉钟社的文化思想研究中，能够将他们与他们上一代（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进行比较，较准确地为他们进行文化定位，而从中我们自然能看到文化、文学思想的时代变化。这些，都是我觉得作者做得出色的地方，但如果从完美的标准来要求的话，我个人觉得在宏观的把握上应该更明确一些，如果能够单列出一章来讨论浅草—沉钟社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这样，就会更加凸显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了。

2002年11月22日

目 录

序.....	杨 义(1)
绪论.....	(1)
第一节 浅草—沉钟社的诞生.....	(4)
第二节 浅草、沉钟关系考辨.....	(19)
第三节 浅草—沉钟社的历史流变	(38)
第一章 浅草—沉钟社的文化思想	(49)
第一节 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	(50)
第二节 浅草—沉钟社文化思想的现代性	(65)
第三节 浅草—沉钟社的文化心理特征	(89)
第二章 以人为归趋的二元文学观.....	(104)
第一节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	(107)
第二节 文学的特征：“思想”与“情感”	(117)
第三节 文学的功能：“为人生”与“为艺术”	(123)
第四节 二元文学观的形成.....	(130)
第五节 二元文学观的意义	(146)

第三章 浅草—沉钟社的个性主题	(155)
第一节 个性觉醒前提下的个性主题的出现与持守	(157)
第二节 个性主题的表现模式	(181)
第三节 展示个性主题的形象谱系	(199)
第四章 浅草—沉钟社的社会主题	(222)
第一节 乡村人生的痛苦面影	(226)
第二节 都市生活的斑驳光影	(241)
第三节 军阀混战的恐怖剑影	(257)
第五章 疏放:浅草—沉钟社创作的风格形态之一	(271)
第一节 情感作为表现中心	(277)
第二节 抒情方式:宣泄与倾诉	(288)
第三节 随意的文体	(300)
第六章 柔婉:浅草—沉钟社创作的风格形态之二	(311)
第一节 情感的净化	(312)
第二节 委婉的抒情	(324)
第三节 纯净的文体	(335)
第七章 谨严:浅草—沉钟社创作的风格形态之三	(344)
第一节 再现中心:人物与环境	(344)
第二节 再现方式:叙述与描写	(354)
第三节 缜密的文体	(364)
参考文献	(374)
后记	(377)

绪 论

浅草—沉钟社是“五四”时期出现并活动至30年代中期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它以自己的辛勤劳作和丰硕成果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切实的贡献，在当时及以后均受到了文坛的关注和肯定。1925年4月，在北京大学教员预备室里，冯至将一本第4期《浅草》默默地交给了鲁迅。鲁迅慨叹：“阿，这赠品是多么丰饶啊！”而且，“就在这默默中，使我懂得了许多话”；在这本刊物中，他读出了那些“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们”“被风沙打击得粗暴”的“魂灵”。^①《浅草》停刊后，新起的《沉钟》受到了文坛更加广泛的关注。有“超人”气质的狂飙社的高长虹力贬一切，独独推崇《沉钟》，认为“近来新出的定期刊物，可注意的只有《沉钟》一种”^②。心性孤高的新月社的朱湘也赞许“《沉钟》是当今文艺刊物中出色的一种”^③。鲁迅当时对该社成员的努力也做出了高度的评价，指出：“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

① 鲁迅：《野草·一觉》，《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224页。

② 高长虹：《走到出版界》，《狂飙》第3期，1926年10月24日。

③ 朱湘：《杨晦》，《新文》第1卷第2期，1927年。

全国真成了沙漠了。”^①据李霁野回忆，鲁迅在北京时常常提到沉钟社的杨晦、冯至、陈翔鹤、陈炜谟，“很喜欢他们对文学的切实认真态度”。^②

到30年代，该社在文坛上仍然享有较高的声誉。1933年，大型文学刊物《现代》第三卷开设“文艺史料·逸话（杂文）”专栏。在该卷六期中，关于中国新文学社团，该栏组织编发四篇文章，介绍了四个社团。这就是：茅盾的《关于文学研究会》（第一期）、张资平的《曙新期的创造社》（第二期）、杨村人的《太阳社与蒋光慈》（第四期）及陈翔鹤的《关于“沉钟社”的过去现在及将来》（第六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浅草—沉钟社的影响。

1935年在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组织下，新文学界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进行回顾和总结，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负责编选文学研究会小说的茅盾在论及“五四”后“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定期刊蓬勃滋生”的情景时，提到了浅草社及《浅草季刊》。^③而负责编选除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外其他文学社团创作的小说的鲁迅，更是对浅草—沉钟社的创作做出了精要的概括和较高的评价，称《浅草》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并盛赞“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

① 鲁迅1927年9月25日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11卷，第583页。

② 李霁野：《忆在北京时的鲁迅先生》，《文艺报》1956年7月15日第13期。

③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选集》第5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页。

体”。^①该社共有林如稷、顾随、冯至、高世华、莎子、陈翔鹤、陈炜谟等7人的12篇作品入选其中。作者和篇数均占总数的1/5强，是同类社团中入选最多者。这实际上也从一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对该社总体文学成就的评价。

从以上引述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浅草—沉钟社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影响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对这一社团的研究也就具有了独立自主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这一研究对于此期文学史的考察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由于知识分子现代个性意识和集团意识的双双觉醒，在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比较普遍的“重文”倾向；而在“重文”、“从文”的潮流中，由于主客观方面的诸多因素，志同道合进而结为社团者，比比皆是。虽然文人结社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远非始于“五四”时期，但从其广泛性、普遍性来看，却确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主要是一部社团流派的演变史。这种情形实际上也是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这正如法国波尔多文学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罗贝尔·埃斯卡皮所说，文学同时属于三个世界，即“个人智慧、抽象形式及集体结构”。^②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每一种文学思潮的出现，每一种创作倾向的形成，我们几乎都能从中看到社团的背景和身影。反言之，每一个社团作为一个局部对文学史这个整体来说几乎都具有结构性的意义。而对浅草—沉钟社这样一个具有较高文学成就和较大文学影响的社团的

①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2、244页。

②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研究,对于丰富此期文学史的研究内容、厘定其框架结构显然更具有历史的价值。

浅草—沉钟社是一个取得较高文学成就、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文学社团。虽然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鸟瞰“五四”时期的社团时有所涉及,有数位研究者也写过一些对该社作总体研究的论文及著作,但这与其自身的地位、价值相比是不相称的。显然,对它的研究还需要做广度上的拓展和深度上的开拓。本书意在这些方面作一尝试。

第一节 浅草—沉钟社的诞生

文学社团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集团。根据社会学的原理,所谓集团是指为一定的目的而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社会团体。它的构成有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其中的每个成员均有共同的社会活动的目标;第二,它必须是一个实体组织;第三,集团中的成员必须有鲜明、强烈的集团意识。而文学社团则是指由知识阶层为了共同的目标,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从事文学活动的社会团体。

浅草—沉钟社作为这样的一个社会团体,诞生于1922年初。它最初的得名和“定局”始于1922年初林如稷与罗石君的“围炉聚话”。^①这一开启了该社团十余年文学生命的活动看似偶然,却内含着必然的因素。为什么两人在此时会做这样的私下聚话?为什么他们会产生结社的意愿?而这一意愿又为什么会得到众人的响应而迅速形成一个文学实体组织?深入思考这些问题,会促使我们深刻地把握到这一社团诞生的真正原因。

^① 见陈炜谟《给读者》,《文艺周刊》第41期,1924年7月8日。

首先，浅草—沉钟社的诞生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结果。浅草—沉钟社成员基本上都出生于20世纪初年。在“五四”运动前，他们在学校里接受的仍然还是封建复古教育。时在四川成都的陈翔鹤事后回忆说：“在1917—1918之间，正是‘五四’运动的前一、二年，我记得那时我正在成都的一个中学读书……在与思想密切有关的语文方面，读的尽是封建性十分浓厚的‘古文辞类纂’、‘唐宋八家抄’一类的东西。”^①即使是处在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冯至在北京四中学习时对“一些传播新文化提倡新文学的报刊杂志，在‘五四’前我们连名称都不知道”。^②但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一股清新的文化之风开始吹进死寂的中学校园。陈翔鹤在“五四”运动前夕就阅读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并受李大钊《青春》一文的影响，立下了“要恢复祖国的青春，做个有作有为的中国新青年”的志向。与陈翔鹤一样，一批川籍学生林如稷、陈炜谟、高世华、李开先以及王怡庵等不满于四川总体上闭塞落后的文化氛围，纷纷于“五四”运动后（个别的在此之前）离开四川，前往北京、上海等现代大都市求学。例如，陈翔鹤就是“在五四运动的激励之下，背着家庭私自从四川跑到上海读书的”。^③在京沪等地，这批后来成为浅草—沉钟社骨干成员的青年学生新的文化氛围中或径直考入大学学习，或渐次完成了由中学到大学学习的转变，并由此迅速实现了“人的觉醒”和“人的发现”。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冯至事后的这段回忆对他们来说

① 陈翔鹤：《略谈“五四”时代青年人的人生观》，《新港》1959年5月号。

② 冯至：《我在四中学习的时候》，《冯至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页。

③ 杨晦：《怀念翔鹤同志》，《文艺报》1980年第1期。

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那些传播新文化提倡新思想的刊物在“五四”后“都不胫而走地进入了宿舍和课室，我们从中学到了许多过去不懂得道理，也获得不少从前难以想像的知识。……我们只要阅读后略有领会，便如大梦初醒”。^①

这批从封建思想的禁锢中觉醒过来的青年学生，由于确立了新的文化思想，^②必然要以此为武器来独立地发表对社会、现实和人生的见解。当时年仅15岁的冯至就参与创办了《青年》，“于1920年寒假后印成小册子出版了”；^③林如稷于20年代初在《晨报》上发表了几篇反对封建复古教育的文章以及揭露封建压迫和川中兵祸的白话小说；而李开先也于1922年3月在《小说月报》第13卷第3号上发表了描写四川的“棒老二”绑人勒索的《埂子上的一夜》，表现了“说明那产生‘棒老二’的四川的特殊社会背景的企图”。^④“人的觉醒”是这批青年学生独立地发表意见的最主要的条件，而他们以文学的方式来抒发怀抱，则又与“文的自觉”密切相关。

所谓“文的自觉”是指对文学作用的重视和对文学事业的笃信。刘纳在比较文学研究会与前期创造社作家性格时指出：“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作家们对文学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然而，他们无不把文学看作一种事业，值得为之献出毕生心血的神圣事业。……他们以中国作家从未有过的自豪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开始新的文学生涯。在‘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更存在着‘重文’的倾向，一批批有为青年，怀抱新的生活

① 冯至：《我在四中学习的时候》，《冯至全集》第4卷，第388页。

② 详见第一章。

③ 冯至：《记陈展云》，《冯至全集》第4卷，第381页。

④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选集》第5卷，第235页。

旨趣和笃信自己事业的信念，堂堂正正地走上了文学道路，立志为祖国的新文学献身。”^①显然，后来成为浅草—沉钟社成员的这一群是“五四”以后具有“重文”倾向的有青年的代表。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崛起于“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此之前，殷商、西周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学在官府”，学术文化为官府所把持，从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文化模式。但自东周开始，“礼崩乐坏”的动荡现实使王官失守，诗书礼乐的传统流散到从古代“封建”秩序中游离出来的“士”阶层之手。“士”开始成为“道”的承担者。孔子说：“士志于道”，所强调的也正是“士”必须以“道”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而“中国知识分子所恃的‘道’是人间的性格，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因此之故，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和政治权威发生了面对面的关系”。^②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以“道”自守，并以道统影响政统；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政统影响力的发挥却又往往需要以自己对政统的依附作为前提和条件。这种人格和处境的悖谬状态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这一通向政统的桥梁终于崩坍了。后来成为浅草—沉钟社成员的这批青年学生大都出生于1905年前后，与他们上一代相比，他们对科举不再（也不可能）抱有幻想（而他们上一代如鲁迅、陈独秀等却也曾参加过科举考试）。正是从他们这一代开始，出现了“一个‘时代’的大征象——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体感受到与政治社会的

① 刘纳：《论“五四”新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②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

疏离 (alienation)”，“廿世纪的中国，政治上动荡不安，早期军阀割据，使得大部分知识分子与政治脱了节”。^① 从政坦途的崩裂，使他们对政治不再偏执，不再迷信，而开始致力于社会、文化。因此之故，知识分子数千年来恒久不变的人生模式被打破，在他们眼前呈现出了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在经历了“人的觉醒”之后，他们有许多关于人生的成熟或幼稚的见解要发表；同时又正值中国多事之秋，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时代的良知也不容他们保持缄默。于是，文学创作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当然选择。这也是为什么“五四”时期会涌现这么多作家、社团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正如李欧梵所说：

从事文学写作，对于古代的士大夫阶级，是一种业余的消遣……但在廿世纪初期的中国，写作不但成了“正业”而且成了知识分子仅有的少数职业之一。知识分子当然可以教书，也有不少“文人”在大学里兼教职，但学院毕竟是一座象牙塔，正值多事之秋，不少“悲天悯人”之士，不愿意逃避在书堆里，而且，正逢“五四思潮”鼎盛之时，不少人想从小说、杂文中来改革社会风气，介绍西方文化的新潮流。^②

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冯至、林如稷、李开先他们几乎在不经意之间自然而然地实现了“文的自觉”，建立起了对文学事业的笃信。

① 李欧梵：《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177页。

② 李欧梵：《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出处同前，第179页。